

诺贝尔文学经典

局外人

鼠疫

【法】加缪著
杨广科 赵天霓 陈属玉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经典

局外人
鼠疫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局外人；鼠疫 / (法) 加缪 (Camus,A.) 著；杨广科，赵天霓，陈属玉译.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506-0259-5

I. ①局… ②鼠… II. ①加… ②杨… ③赵… ④陈…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②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5278 号

书 名 局外人 鼠疫

著 者 (法)加缪

译 者 杨广科 赵天霓 陈属玉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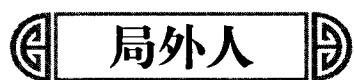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68657290)

目录



局外人	001
鼠疫	081



序言

这是一本“荒诞”的小说，一个扭曲、充满了黑色幽默和哲学的故事。

第一遍看的时候有些愕然，主人公的母亲去世了，然而他竟然用一种极其平淡的口吻来述说这个令人悲伤的事——“今天妈妈死了，或许也可能是昨天”，这是因为他搞不清楚电报中写的具体时间。

在为母亲守灵的过程中他不想开棺看一眼母亲，因为那样很麻烦；他在棺材面前抽烟，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观察形形色色的来守灵的人，并且不乏幽默地在心中评论他们。在葬礼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任何哭的意思，更“荒诞”的是，葬礼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女友去海滨游泳、看滑稽电影、带回住处过夜。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冷漠、无情、扭曲的主人公，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当女友提出要结婚的时候，他竟然觉得“自己大概是不爱她的”，可是结婚并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他答应了。

“没有什么不妥”的想法还在整个小说里出现了很多次，帮助邻居写信教训邻居的情妇没有什么不妥，所以答应了；老板安排去巴黎开办办事处，没有什么不妥，所以答应了……

主人公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地理性地而又非理性地存在着。

就在我们好奇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的时候，故事走到了最后，主人公因为杀了人被判处死刑，而检察官指控他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流泪。

看完整个故事，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违背世俗的事情就是错误的吗？小说在告诉我们：母亲去世，就应该痛哭，这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一旦有人违背

了这个“习惯”，他就是有罪的。

看到这里就明白了“局外人”的含义——处于社会法则之外的人。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凡是违背它反抗它的人，就必须受到惩罚。

可是回头又想，对于主人公来说，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局外人”呢？世间万物总是相对的，对于社会来说社会抛弃了他，对于他来说他又抛弃了社会。对于世界来说他是荒诞的，对于他来说世界又何尝不荒诞呢？

于是我们豁然，原来他的所有冷漠，不过是对这个“荒诞”社会、“荒诞”生活的反抗。

我们再次回到荒诞上，荒诞艺术源起于西方，是一种用离奇的故事来讽刺现实的手法，是西方存在主义的一个分支，曾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想。

为何这种流派会流行起来？我们还要谈谈当时西方的大背景——二战结束。二战爆发后，西方国家因为深陷战争，大多数人普遍感到一种不安和绝望，这种心理的蔓延逐渐使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人是毫无意义的，这就使得荒诞主义鼎盛起来。

或许对于一些中国读者来说，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这位法国的优秀作家于1957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包括剧本《误会》、《卡利古拉》，中篇小说《局外人》，长篇小说《鼠疫》，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等。

加缪的成名作就是这部《局外人》，作为存在主义荒诞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优美的句子，笔调十分简单、明快，多采用白描的手法，甚至初读会给人一种有些“枯燥”的感觉。但是正是这种笔调，给整个故事都笼罩上了“荒诞”的色彩，带给了读者无限的思考空间。

主人公到最后临死前，依然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并对死亡毫不在乎，这种执着，其实是源于他的真实。母亲死了，他是真的哭不出来；扣动扳机，也是真的因为太阳晃眼。可是他违背了“常理”，所以他只能是一个“杀人恶魔”，是处于整个世俗之外的“局外人”！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演绎“荒诞”？

杨广科

二零一零年九月于成都眷诚斋

局外人 上部

1

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收到养老院寄来的电报写着：“母死，明日葬。深表哀悼。”电报没说具体时间，妈妈也可能是昨天走的。

养老院在距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马朗戈。我乘下午两点钟的公共汽车过去，傍晚之前应该能赶到。我将在那里待一晚为妈妈守灵，明天晚上再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很显然，这样的情况他是不能拒绝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到他有些气恼，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道：“先生你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错。”

他没答话，我想我本不该这么对他说。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歉的，倒是 he 应该向我表示一下哀悼。大概后天他看见我穿着丧服的时候会这么做吧。现在的感觉好像是我的妈妈还没有死。不过一旦下葬，那就可以说是正式盖棺论定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那天天气很热，我照常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午饭。人们都来安慰我，赛莱斯特还对我说：“我们都只有一个母亲。”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了门口。我有点烦，想急着离开，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去艾玛努埃尔那里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死了叔叔。

我是跑着去赶的汽车。走得匆忙加上一路的疾跑，明晃晃的太阳照射在地上，再反射到我脸上，颠簸的汽车，一股子的汽油味，弄得我一上车就昏昏欲睡。一路上我几乎都在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的身上；他冲我笑了笑，然后

问我是不是打别处来的，我只点了点头，不想说话。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的路。于是我赶路过去。我急着想见到妈妈，但是守门人说我得先去见院长。他那时正忙着，我还得等一会儿。守门人就利用这时间喋喋不休地和我说起话来；然后他才将我带去办公室。院长是一个小老头，肩上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随后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让我感到有些窘迫。他看了看桌子上的档案，然后对我说：

“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这里的。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你就是她的唯一了。”

我感觉到他是在责备我什么，于是我马上试图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

“没有必要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您母亲的档案，很显然您没有办法负担和照顾她。她需要有人一直在她身边照料，而您的薪水又无法承担看护费。综合考虑，她在这里会更安逸。”

“是的，先生，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不错，她在这里有很好的朋友，您知道的，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喜欢回忆过去，有相同爱好的朋友。而您太年轻了，和您待在一起或许她还会觉得闷呢。”

这话倒不假，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总是一天到晚地看着我，但是我们却很少交流。她刚进养老院的几个礼拜哭得很厉害，可那是因为她还没习惯。一两个月后如果让她回家，她也会哭，那也是因为不习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一年来我很少来看望她。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来看她就必须利用星期天，而买票、赶车、颠簸两个小时也确实费精力。

院长还在说着什么，但我也没心思听，最后他说：

“我想您应该很想见见您母亲吧？”

我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他带着我走出了门。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解释说：

“我把她的遗体放在了一个小停尸间里——因为担心惊扰到其他老人，您可以理解的吧。

这里每逢有人死了，他们总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安定下来，当然，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

我们穿过了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些老人，他们正三五成群地闲聊着。当我们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不作声了；而当我们走过去，他们就又开始聊了起来。他们说话的声音让我想起笼子里叽叽喳喳乱叫的鹦鹉，一刻也不得安宁。走到一座小房子的时候，院长停在了门口。

“我就送您到这，默而索先生。如果有任何事情，请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计划的葬礼在明天早上。所以我想您有一整夜的时间守在您母亲的棺材边，如果您愿意的话。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从您母亲的朋友那里听说她曾表示希望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告诉您一声。”

尽管我知道母亲并不是无神论者，但在她有生之年也从未有过什么宗教信仰，不过我还是谢了他。

我走进了房间。这是一件明亮、干净的房间，有一个大型的玻璃天花板，四面墙都刷着白灰。家具有一些椅子和几个X型的架子。中间的架子上放着一具盖着盖子的棺材。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清晰可见一些发亮的螺丝钉的钉帽，是刚钉进去的。旁边站着一个阿拉伯女人，我想大概是护士吧，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头上围着一方颜色鲜艳的头巾。

正在这个时候守门人来到了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着进来的，因为他说话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把它盖上了，我来帮您打开它，让您看看母亲。”

他走近了棺材，但是我对他说不用麻烦了。

“哎？为什么？”他大声说道，“您不想让……”

“不想。”

他把螺丝刀放回了口袋，然后看着我。我认识到我不该说不想，这让我感到有些尴尬。他看了我一会，然后问道：

“为什么？”但是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看起来只是想问问而已。

“呃，说真的我不知道。”

他开始捋着他发白的胡子，也不看我，用温和的语气说道：

“我能理解。”

他看上去挺友善，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微微发红的脸颊。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的身后。那名女护士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守门人在我耳边窃窃私语地说道：

“真可怜，她长的是恶疮。”

于是我小心地、悄悄地看了她一眼，我注意到她的头上，眼睛以下的部位都缠着绷带，而她鼻子的那个位置却是平的，脸上除了白色的绷带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当她走出去，守门人又对我说：

“我想该让您一个人待会。”

我不知道是否是我做了什么手势，他说完话后并没有走，反而是站在了我椅子背后。他这一举动让我感觉很不自在。

现在太阳就要下山了，但是整个屋子依然很亮。两只大黄蜂“嗡嗡嗡”地贴着天花板乱飞。我困得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我转过身子，问守门人在这里干了多久了。

“五年了。”他快速地回答着，就像是在等着我问他一样。

接着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还将在马朗戈养老院干上十年直到老死在这里，他一定不会相信。他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是巴黎人。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打断了他，“这么说你不是本地人？”

问完我才想起来，就在他带我去见院长之前，他和我聊到我妈妈。他说过要赶紧下葬，因为平原地带天气很热，尤其是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巴黎居住过，并且还对那里记忆犹新。他在巴黎，遗体可以在家里停放三或者四天，但是这里不行。

“在这里时间实在太仓促了，你还没来得及想，人就该下葬了。”

当时他老婆打断了他，“够了，这种事不该对这位年轻的先生讲。”

守门人脸一下子红了，连连向我道歉。我说没事，我倒觉得他讲的很对也很有趣。

现在他继续说到，他当初来养老院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但是他的身体还很强壮结实，于是就自荐当了守门人。

我指出他和其他被收容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是一个“管理者”。之前我就觉得奇怪，当他说起养老院里其他人的时候，他总是说“他们”或者“那些老家伙”，甚至其中有些人并不比他年龄大。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作为一个看门人，在某种程度来说他的确是管着他们的。

这时护士又进来了。天黑得很快，眨眼间，夜幕笼罩了天花板的上空。守门人打开了灯，突然的光线让我感到有些目眩。

他提出带我去餐厅吃饭，但是我并不饿。于是他又建议给我送一杯牛奶咖啡来。我非常喜欢牛奶咖啡，于是我同意了并说了谢谢。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口咖啡，烟瘾上来了。但是我有些犹豫，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妈妈遗体面前，抽烟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认为并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递给守门人一支烟，同他一起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您知道的，您母亲的朋友一会儿也要来，和您一起为她守灵，这是一种习惯。我得去找一些椅子，再端些黑咖啡来。”

灯光照在雪白的墙上格外刺眼，于是我询问守门人能否关掉一盏。他说不行，这种灯就是这样全关全开的设计。后来我也没再注意他。他进进出出，搬进来几把椅子，将它们围着棺材摆好，又在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了十多个杯子。然后他隔着棺材坐在了我的对面。女护士坐在房间的另一头，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胳膊的动作来看，我觉得像是在织毛线。咖啡令我有些发热，我感觉很舒服，从敞开的门外飘进来一股清爽的夜的味道和一阵阵花香。我想我是打了一会儿盹。

我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弄醒。当我睁开眼睛后，我感觉到房间里比之前更加白亮了。在我面前，所有东西都是那么一览无遗，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每一根线条，都清清楚楚，轮廓分明，没有丝毫的遮掩。那些老人——我母亲的朋友，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我估摸着有十来个人，他们悄无声息地在这晃眼的灯光下挪动。当他们坐下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响动。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没有这么清楚地看过人。他们衣服、毛孔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法逃过我的眼睛。但是我没听见

他们发出任何声音，这真让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于这里。

几乎每一个女性都围着围裙，系在腰间的带子让她们的肚子显得更大了。我之前还从来没有注意到上了年纪的妇女会有这么大的肚子。而男人们大多都很瘦，他们都拄着拐杖。更让我惊讶的是，我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眼睛，唯有从一堆皱纹中闪烁着的一缕混浊的亮光。

他们坐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看了我一眼，略带些不自然地点点头，嘴唇陷入了没有牙齿的嘴里。我不能够肯定他们点头是向我打招呼还是由于他们的年龄而不自主地抽动。我还是愿意相信他们是在给我打招呼。点过头后，我发现他们都摇晃着脑袋坐到了守门人的附近，也就是面对着我坐下。这一刻，我有种可笑的、模糊的感觉，我感到他们是来审判我的。

过了不一会儿，一位女士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我没有办法看清她的脸，因为她前面还坐着一个女人。她低声呜咽着，我感觉她短时间内是不会停止了。其他人好像都没有注意到似的。他们神色凝重悲伤，沉默不语。一会看看棺材，一会看看手杖，一会又东张西望，注意力就只在这些东西上来回走动，完全不去看那个哭泣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好奇，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很想过去对她说别哭了，但是我不敢。过了一会儿守门人弯下腰对她说了一句，可是她摇了摇头，嘴里小声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然后她依旧继续哭着。

接着守门人起身向我走来，坐在我的身边。一开始他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才看着别处对我说道：“她是您母亲的好朋友。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您母亲的去世让她变得一无所有了。”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就这样沉默着。那个女人呜咽的声音渐渐减弱了，但依然在抽泣，又过了好一会儿，总算是停了下来。

我的睡意已经退去，但是我感到有些疲惫，腰酸背痛。此刻，这些人的沉默让我感到难受，我只能偶尔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起初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但是过了一会我就猜到了声音的来源，那是一些老头吸自己腮帮子而发出的声音，不过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冥思中，浑然不觉。我曾经甚至认为他们毫不在意躺在中间的死者。但是现在我发现那是一个错误的猜测。

我们都喝了守门人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知道了。就这样过了一夜。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偶尔睁开眼睛，可以看见那些老头们一个个蜷成一团睡觉，唯独有一位，下巴放在杵着手杖的手背上，盯着我看，就像他在等我睡醒一样。

随后，我又睡着了。但是因为腰痛不断，我还是从睡梦中醒来了。初升的太阳之光悄悄地爬上了玻璃窗。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头醒了，拼命地咳嗽。他掏出一块方格子的大手帕，往里面吐痰，每吐一口痰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其他人也被吵醒，守门人说他们该离开了。

于是他们站了起来。这样别扭地睡了一夜，使他们一个个都面如死灰。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出去时竟然都和我握了手，好像过了这么一个相对无言的夜晚，我们的亲切感就增加了似的。

我有些累了。守门人把我带到他那里，我洗了脸，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感觉很好。当我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在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泛出了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中带着一股盐的味道。看来应该是个好天气。我很久没有来乡下了，如果不是妈妈的事，现在出去散散步该多好啊。

我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等着。闻着湿润的泥土气息，顿时有了些精神。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起床准备去上班了，而对于我来说，这是每天最难熬的时刻。我的思绪被房间里传来的铃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传来一阵喧闹声，随后又安静了下来。太阳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的双脚有些发热了。

这时，守门人穿过院子过来说院长想见我。于是我去了院长的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字。我打量了一下，院长今天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拿起电话，问我：

“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了，您想最后再看看您母亲吗？”

我说不用了。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着，“费雅克，通知那些人，他们可以过去了。”

放下电话，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表示了感谢。随后他在写字台后面叉起两条小腿坐了下来。他告诉我送葬的人只有我、他还有执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

老人是不被允许去送葬的，只能参与守灵。他表示这是个人道问题。不过他又说这一次他破例允许我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参加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对我解释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些孩子气。他和您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爱拿他们开玩笑，他们总是对贝莱兹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只是笑笑。他们觉得有趣。然而这次默而索太太的死令他非常难过，我认为不应该拒绝他。但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我昨晚没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来往窗外观望。过了一会儿他说：

“马朗戈的神甫来了，他倒是提前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四十五分钟才能到教堂，因为教堂在村子里。随后我们下了楼。神甫和两个唱诗的小童等在门口。他们其中一个人的手上拿着香炉，神甫弯下腰，调好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的时候，神甫已经站了起来。他管我叫“儿子”，同我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跟着他走进了屋里。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被旋进去了，屋子里站了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说车子已经等在路上，神甫开始了祈祷。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在上面盖了一条毯子。神甫、唱诗的小童、院长和我，一起走了出去。

门口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这位是默而索先生，”院长向太太介绍我。我没听清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的代表。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向我低了低瘦骨嶙峋的长脸表示打招呼。我们站成一排，让抬棺材的四人先过去，然后我们跟在棺材的后面，走出了养老院。

送葬的车就停在大门口，长方形，漆得发亮，让人联想起铅笔盒。旁边站着葬礼的司仪，身材矮小，衣着有些滑稽，还有一个看上去举止不安的老人，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表示敬意），裤脚堆在鞋子上，白领衬衫太大了，而黑色的领花又太小。鼻头上布满了黑点儿，嘴唇在不住地抖动。满头的白发看上去有些柔软，两只耷拉耳，耳轮显得有些皱，血红的耳朵加上苍白的脸，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司仪安排了我们的位置。神甫走在最前面，然后是车子。旁边是四个抬棺材的。再后面是院长

和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则走在最后。

外面的太阳光很亮，直射到大地上，地面温度迅速上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出发。身上的深色衣服使我感到闷热。小老头把帽子戴上了又重新摘下来。院长跟我谈到他时，我转向他那边一点，望着他。院长告诉我，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傍晚的时候经常由一个女护士陪着散步，有时候会一直走到村子里去。我望着周围的田野：一排排通向天边小山岗的柏树林，红绿相接，周围的房子不多，却错落有致。我能理解母亲的心理，在这样的地方，傍晚该是一段令人感伤的时刻。今天，火辣辣的太阳使这片景致在人眼前晃动，显得无情而又令人疲惫。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贝莱兹有点瘸。车子渐渐走快了，老人落在了后面。车子旁边也有一个人跟不上速度，落到后面和我并排走着。我感到有些奇怪，太阳怎么升得那么快。我发现田野里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沙沙的风吹草动的声音。我脸上开始流汗。我没有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个伙计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他用右手掀了掀鸭舌帽的帽檐，左手拿手帕擦着额头的汗。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空，连声说道：

“晒得够呛。”

“是啊。”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里边是您的母亲？”

“是的。”

“她年纪大吗？”

“还好。”我回答着，其实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岁了。

他不再说话了。我回头看了看，老贝莱兹已经落下了五十多米远。他一个人急急忙忙地往前赶，手里摇晃着帽子扇风。我又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也顾不得去擦。

我感到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有些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都裂开了，脚一踩就陷进去，留下一道明晃晃的烈日。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油泥里浸过似的。我有点迷迷糊糊的，头上是蓝天白云，周围尽是些单调的颜